

# 论严歌苓小说多侧面的时代人生与人性书写

薛倩

渤海大学文学院

[摘要]在80年代严歌苓最初的“女兵系列”创作中,我们已经能够看到严歌苓想表达的道德理想主义的痕迹。在她90年代至新世纪的写作中,她将这种道德理想主义的善与美的追求,与对女性的观察视角和心理书写紧密结合,写出了《少女小渔》《扶桑》等,极具女性主义冲击力的作品;而当这种写作的模式转移向历史题材,她倾心塑造的女性形象如王葡萄、冯婉喻等,就具有一种以善与美的人性力量救赎时代之恶,穿透时代之恶的意味,这又使她的创作带有一种新历史主义写作的倾向。但无论如何以“新历史主义”、“心理分析”等为标签去标示严歌苓的多重写作,总会让人觉得并不贴切,也不完整,事实上,严歌苓并不需要这种种的标签,书写人性的种种存在,表现人性的善与美,始终是她的单纯而稳定的追求,这超越于所有的固定写作模式和标签之上。

[关键词]严歌苓;女性形象;人性

【DOI】10.12252/j.issn.2096-627X.2021.10.454

## 一、人性的创伤与时代的荒唐:严歌苓的文革叙事

严歌苓曾经有一段军旅生活的经历,她1970年进入成都军区,成为一名文艺兵,并在1979年以战地记者的身份参加了对越自卫反击战。这一段军旅生活提供了宝贵的创作素材,在她成为专业作家并开始写作后,“女兵”就顺理成章的成为她描写的对象。

《雌性的草地》书写了一群姑娘在条件恶劣的川藏高原上放养军马的故事,她们响应政治话语的号召,组成了牧马班。青春的骚动被压抑下去,性别的特征被泯灭,无私奉献成为这群年轻姑娘生命的准则。虽然在高原之外,世界早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文革已经结束,但是这群牧马班的女孩子们,却也被历史遗忘。班长沈红霞是这一群姑娘们最突出的形象,她严守纪律,有着极为严格的自我约束力,从不涉足男女之情,把一切奉献给牧马班,即使最终失明并失去了双腿,也守候着军马,成为为理想而生存的英雄典型。另一个女性形象小点儿,则显现出人性的复杂,她善于利用自己的美貌去俘获男性,她千方百计的混入了牧马班,但严肃的生活改造了她,她开始反思自己过往的错乱的生活,并重新认识自我。营长的爱情,给了她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最后因救火葬身火海,在此小点儿重获了做人的尊严,完成了对此前人生的超越和自我的救赎。

显然,严歌苓通过这样的故事寄托着她对青春的怀念和反思。一方面,革命年代的神圣话语,塑造了这一代年轻人的思想意识甚至是情感方式,革命的神圣感成为烙印在这一代年轻人心中不容抹去的记忆,革命规训了年轻人也塑造了这一群人;另一方面,女兵们受到时代的话语熏染而产生理想主义情怀,但对这种信仰的追求与坚持又暴露出人性被压抑、被扭曲的残酷真相,这又是需要反思的历史内容。

严歌苓笔下的这些女兵形象,都是不谙世事、单纯善良的,在文革时代,她们都经受了时代的播弄和压抑,她们以

青春甚至生命的牺牲与奉献,书写了一段苦闷甚至残忍的青春史,她们都是时代洪流中的微尘,是荒唐时代被牺牲的小人物。严歌苓对这些小人物寄予了深深的同情,对她们残酷青春的书写,实际上也是对自己过往青春的伤悼,小说对时代的反思和批判是显而易见的。

如果说,在女兵系列的小说创作中,严歌苓表现出对青春时代的革命激情的回望和对革命时代的反思,批判的话,那么随着创作的延续和作家思考的进一步深入,她对文革时代人性畸变和荒唐处境的观察愈加透辟,于是在她新世纪之后的创作中,表现文革时代人的生存的错位与压抑,成为她重点关注的内容。长篇小说《芳华》,以20世纪70年代部队文工团的生活为背景,叙述了一群文艺兵的生活和遭遇,较为集中的体现了她的这一创作特点。

构成《芳华》情节冲突核心的,是时代虚假理想主义所营造的禁欲氛围和人的自然欲望之间的冲突。刘峰作为文工团里的“学雷锋”标兵,时时处处以英雄样板要求自己,他活成了一个神,不能有私欲和人间烟火气,更不可能跟情欲扯上关联。而事实上,刘峰是人而不是神,他也有七情六欲。他对林丁丁有着无限的浪漫幻想,他的情欲在黑暗中滋长,变得不可遏制。“英雄”其实并不是他最终的追求,成为“凡人”才是他强烈的“本我”要求,刘峰在“凡俗”与“成圣”之间形成了强烈的错位与压抑,人性在长久的禁锢压抑状态下,终于偶然爆发。在一次偶然之间,他有意无意中触碰到了林丁丁的身体,而引发了一次影响极大的“触摸”事件,敏感的林丁丁破口大骂,拼命逃离了现场,并把事件大肆张扬,最终使刘峰身败名裂,受到了处分,这尊道德的“神”也便轰然倒塌。

小说富有意境的写出了在“触摸事件”发生之后,“我”、郝淑雯及众多女文工团员们,几乎众口一词的表现出对刘峰的愤恨和抵制情绪,她们同仇敌忾,孤立了刘峰,

使他陷于舆论口诛笔伐的万劫不复之地。小说通过这种叙事，揭示了普遍存在的青春的苦闷和时代之恶。一方面是那个虚假理想主义泛滥，将人幻化为“神”所造成的时代境遇的压抑，它形成了普遍的禁欲主义的氛围，他逼迫着年轻一代精神、思想的自我改造，也造就了这一代年轻人人性的压抑与苦闷。但另一方面，人性对这种时代压抑的不自觉反抗，也形成了普遍的恶意心理，那就是对所有真与善的怀疑和冷漠，在人失足落水时漠然旁观甚至落井下石的快意和期待。这种恶意显然也是长期的权力话语压抑所造成的人性畸变和结果。

在《芳华》里，不只是刘峰，何小嫚、萧穗子、林丁丁其实某种程度上都生活在一种精神的压抑和分裂状态中，小说通过对这一代青年人精神状态的深刻剖析，揭示了文革威权主义时代氛围下普遍的人性困境，比之于作家早期“女兵系列”的书写，她的创作显然在人性的深层表现上更深入了一层。

## 二、身份的迷失与挣扎的困境：严歌苓的移民叙事

在严歌苓的笔下，海外移民群体大致可以因时代不同分为两类，一类是19世纪华人早期劳工，一类是改革开放之后宜居海外或在海外留学的华人。无论是哪个时代，哪个群体，都面临着移民海外后文化身份的迷失问题。因为中华文化强烈的向心性和凝聚力，海外移民者往往在融入美国社会文化生活时面临强烈的文化阻碍，存在着文化身份迷失的问题。

《少女小渔》中的江伟是小渔的男友，在国内曾经获过全国蛙泳冠军，显而易见，在国内他是成功者。他把懵懂无知的小渔带出国，许诺了未来的美好生活，但现实的处境却是，他和小渔到了国外，完全忙的没有时间相聚，只能上午打工，下午上学。拮据的生活，无望的现实，磨掉了江伟的锐气。为了获得居留权，他产生了歪点子，他让女友以假结婚的方式嫁给老外，借助婚姻取得永久居留权。从江伟自私算计的角度看，他的行为是卑鄙的，但是换个角度看，他又又是可悲的，他失去了原初的身份定位，而新的人生定位在哪里却还没有落实，他便只能依靠牺牲她最亲近的女友，解决自己的身份问题，这是弱者最后的挣扎，可悲可鄙又可怜。

在《拉斯维加斯的谜语》里，也出现了一个自我迷失、人性畸变的老薛。在国内，老薛是化学教授，克勤克俭，极为自律，但一次偶然的机他跟随考察团赴美学习，却在拉斯维加斯的赌场中陷入赌局不能自拔。为了满足不断赌博的畸形心理，他开始撒谎，把借到的钱，无穷无尽的投入赌局，以至于成了别人眼中无可理解的一个“谜”，大学教

授竟然一下子成了一个陷入迷狂的赌徒。无论是江伟还是老薛，一切悲剧的根源其实都起源于主人公文化身份错位的问题，文化身份的失落使他们手足无措，丧失了原本稳定的人性尺度和行为规范，于是畸变与沉沦便成为他们人性的最终走向。

在新移民群体中，留学生是主力，严歌苓曾在作品中调侃道：“美国最穷的不叫乞丐，叫留学生”。<sup>1</sup>描写留学生生活的穷困潦倒，拮据困顿也是严歌苓小说中的主要内容。在《栗色头发》中，小说以第一人称“我”的角度，叙述大陆来的留学生的艰难困顿。一天的欲望只是“多挣钱”和“吃像样的饭”，而在求学之余，必须承担大量的社会劳动才能勉强交得起学费，维持自己的生活，于是“我”在课余给人做人体模特，也给人家做过女佣，承受白人家庭的歧视。这种生活状态在其他留学生中也是常态。

除了困窘的经济生活，移民群体的跨国婚姻往往是不幸的。背井离乡、迁入新的文化群落意味着稳定的生活秩序被打破，此时，人和人之间的情感变得分外功利，冷漠，以往的家庭秩序往往经受严峻的考验，婚姻也便经常成为个人追求的牺牲品，成为利益交换的对象。于是家庭的破裂，婚姻的失败就成为移民群体生活的常态。

因为婚姻的离散，经济的窘迫，海外移民群体往往经受了心理与情感的巨大创伤，于是很多人出现了扭曲和变态的心理，人性出现了畸变，这尤其体现在性心理方面。在小说《女房东》中，主人公老柴是一个年近5旬的中年男性，他的妻子是经济学硕士，在成功的移民美国后，便立刻提出跟老柴离婚，这使老柴手足无措，这位老单身汉独居在地下室里，长期的孤独和对性的渴望使他产生了恋物癖，他不断地对女房东沃克太太产生幻想，在所有可能找到的她用的东西上，闻着她留下的气味，窥探她的私人生活，以获得自己变态的心理满足。

“生的苦闷”和“性的苦闷”，实际上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移民群体中诸多性变态和性压抑，实际上正是这一群体生存艰难境况与人性挣扎的直接写照。严歌苓对这些弱势群体的书写并没有采用社会批判和历史批判的视角，而是往往表现出温情的悲悯和宽容理解，人性的视角使这些作品表现出更为开阔的文化视野，使严歌苓的移民题材小说创作展现出更为厚重的人性关怀。

## 三、“地母”形象的担当与人性的救赎：严歌苓小说的女性叙事

如果要说明严歌苓对“地母”形象的塑造，那么扶桑，就是这个最出色的代表。扶桑是早期华人移民中的妓女，本

来这是一个被别人看不起，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的人物形象。在小说中，扶桑也被不停的转卖，不断遭受侮辱，甚至在大街上被人轮奸。但扶桑对所有的苦难都不经意，她用沉默包容了一切，用笑容接纳了所有的残忍，她成为一个不死的顽强的生命样态，具有异常顽强的生命力。正是这样的特征，让十几岁的白人少年克里斯不可遏制的爱上了扶桑，在克里斯的眼中，扶桑是个真正的、最原本的女性，像土地般的真诚的女性。

本来，扶桑是一个古老中国柔弱、任人蹂躏的符号象征，在白人殖民者与华人妓女之间，存在着征服与被征服，支配与服从的关系。性的关系建立起了一个权力的隐喻。但扶桑以其沉默承担和对所有苦难的化解，表现出以弱胜强的坚韧和顽强。有学者指出，“扶桑要证明的是，弱者自有其力量所在，就如大地的沉默与藏污纳垢。……扶桑就恰如大地。任人践踏，任物埋藏，它是真正的包藏万物，有容乃大。土地有能力藏污纳垢，有能力把污垢转化为生命的能量而孕育万物。扶桑就像是这样一片充满生命力的土地，就是这样一种卑贱而丰饶的文化，一种以弱势生存的生命哲学。”<sup>2</sup>

与扶桑相似，《第九个寡妇》中的女主人公王葡萄，也是具有“地母”性格的人物形象。王葡萄本被孙怀清养在家里打算做自己儿子的童养媳。但不幸的是，抗战期间，王葡萄却成了寡妇。孙怀清在后来的土改运动中，也被认定为是封建地主，组织上判处了孙怀清死刑。在执行了死刑后，王葡萄发现自己的公爹并没有咽气，她开始了一次生命的冒险。她把公爹偷偷背回家，藏在地窖中，尽力伺候隐藏公爹几十年。外界政治风云在不断变化，各种政治运动接踵而来，王葡萄用自己的智慧和坚忍的耐力，让公爹安然度过了历史的劫难，逃过了疾病和饥饿，终于平安的度过了几十年的政治风雨，最后安享晚年。

如果说，扶桑的性格，体现出的是一种平静和内敛的话，那么《第九个寡妇》中的王葡萄，更有着与生俱来的一种“痴”和“热”。“痴”是指她似乎天生就缺点灵活的心眼儿，甚至是有一点蒙昧，在她眼里，就应该救自己的爹，这是天经地义。所谓的政治运动、政治信仰，都与她的人生信条相悖，也都无法真正进入她的头脑，她的心中怀着一种朴素的道德愿望，这种愿望支撑着她穿越了历史的风云，实现了人性的神奇救赎。这种“痴”实际上与天性当中的另一个层面的性格：“热”紧紧联系在一起，对生命的珍视，对情感的维护，对道德的坚持其实都来自天性当中那种热烈的成分。如果说扶桑更多的是一种“圣女”的形象，以自己的

坚韧承担着污浊世界对她的蹂躏践踏的话，那么王葡萄更多的表现出直面现实的勇气，女性凭借着爱和本能，穿透了那个雾霾重重的时代，拯救了伤痕累累的人生，这本身既是传奇又是对伟大“地母”形象的最高规格的歌颂。

严歌苓对女性的由衷赞颂在《陆犯焉识》中体现在冯婉喻形象中。《陆犯焉识》实际上以开阔的视角深度的描写，展开了对中国20世纪历史，知识分子遭遇时的沉重叙事，在小说中，陆焉识与她的妻子冯婉喻是一对，若即若离，互相矛盾，然而互相生成的人物形象，作为高级知识分子的陆焉识，年轻的时候愤世嫉俗，潇洒倜傥，一直以追求自由的生活为目的。而在爱情和婚姻生活中，他也闹出过数段浪漫情缘，而作为居家守常的妻子冯婉喻，在陆焉识的眼中始终无足轻重，甚至成了一种牵绊，一个累赘。但冯婉喻始终以她的善良和宽容，等待和守望她的丈夫。直到建国之后的镇反运动，因言获罪的陆焉识被判处了死刑，此时，冯婉喻奔走忙碌，忍辱负重，甚至牺牲肉体换取了陆焉识被改判，陆焉识最后被发配大西北劳改，而冯婉喻则开始了她又一次长长的期待。

小说情节中的核心段落开始于陆焉识入狱之后，陆焉识慢慢产生对妻子的爱情觉醒，在陆焉识此前的风流韵事中，她对妻子为她付出的爱视若无睹，沉醉在身体自由，自私放任的情欲追逐中。然而在他接受劳改，丧失自由之后，他渐渐悔悟过去的自私，重新唤起了对妻子的思念，并感悟到了妻子对他的深情。这种后知后觉的爱，促使陆焉识不顾一切从狱中逃亡，目的就是为再看妻子和孩子一眼。严歌苓通过对冯婉喻的塑造试图表明：经受政治时代的风风雨雨，只有那最朴素的妻性、母性才能真正穿透所有的阴霾与迷雾，能迎来了人的回归，爱的回归。

从以上对严歌苓小说女性主题的梳理中可以看出，严歌苓在表现人性的善与美的主题时总是与表现传统道德的女性塑造融合到一起，这几乎成为她固定的写作模式。在这种写作模式中，女性的付出与牺牲，有一种为理想殉道，为道德献身的圣洁的色彩。

### 参考文献

- [1] 严歌苓. 雌性的草地[M]. 沈阳: 春风文艺出版社, 1998.
- [2] 严歌苓. 芳华[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7.
- [3] 严歌苓. 扶桑[M]. 西安: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3.
- [4] 严歌苓. 第九个寡妇[M].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18.
- [5] 严歌苓. 芳华[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7.
- [6] 严歌苓. 陆犯焉识[M].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14.